

# 数字公共空间中青年参与社会治理的路径与效能研究

徐沛媛

国防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39

**【摘要】**：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与数字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数字公共空间逐渐成为社会治理的重要场域，也为青年群体参与公共事务提供了新的平台与路径。青年作为互联网使用的主体力量，其在社交媒体、网络社区及数字治理平台中的广泛参与，正在深刻重塑社会治理的运行方式与治理逻辑。本文基于公共领域理论与数字治理理论，围绕数字公共空间中青年参与社会治理的路径与效能展开分析，并进一步探讨其在信息传播、议题建构与协同治理中的作用机制，以期推动青年参与更加理性有序，进而提升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

**【关键词】**：数字公共空间；青年参与；社会治理

DOI:10.12417/3041-0630.26.07.079

## 1 数字公共空间重构下青年参与社会治理的理论逻辑

### 1.1 从传统公共领域到数字公共空间的结构转型

传统公共领域理论以哈贝马斯为代表，强调以理性讨论为基础的公共空间，其主要依托报刊、沙龙等媒介形式实现社会成员之间的沟通与协商。哈贝马斯指出，公共领域是介于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一个地带，公民在此通过批判性讨论形成公共舆论以制约权力。(1)这一理论框架在工业社会时期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公共讨论需要特定的物理空间，参与者往往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市民阶层，信息传播遵循“少数生产、多数接受”的线性模式。然而，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与媒介形态的变迁，这一理论所依赖的社会基础正在发生根本性变化。

这一转型不仅体现在媒介载体的变化上，更深刻影响了社会参与的结构与方式。曼纽尔·卡斯特将这一变革描述为“大众自传播”的兴起，他认为这种基于网络化生产和分发的传播形态，使得个体能够绕过传统媒体门槛，从而重构了社会的权力平衡。从中国的实践来看，这一转型历程清晰可辨：从早期BBS论坛时代的“天涯社区”“强国论坛”，到博客时代的公共讨论，再到微博、微信公众号、抖音短视频等平台的兴起，数字公共空间经历了由“精英表达”向“大众参与”的深刻转变。

具体而言，数字公共空间的结构转型呈现出以下几个显著特征。首先，数字技术突破了时间与空间的限制，使公共表达由线下转向线上，参与主体范围显著扩大。其次，信息传播方式由单向传播转向多向互动，形成“去中心化”的传播格局。再次，公共参与的门槛大幅降低，传统公共领域中对参与者身份、教育水平和社会地位的隐性要求在数字空间中被极大弱

化。在这一转型过程中，作为数字原住民的青年群体，其主体地位的凸显成为数字化生存的必然结果。

### 1.2 数字情境中的青年主体性

在数字公共空间中，青年群体成为最为活跃的参与主体之一。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5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4年12月，10至39岁的网民占比合计达45.1%，青年群体在生成式人工智能产品使用、互联网使用时长和数字内容消费上均处于绝对领先地位。(2)青年处于价值观形成与社会角色转型的重要阶段，对社会不公、环境问题、公共安全等议题具有较高的敏感性，而数字平台恰恰为这种敏感性提供了便捷的表达出口。

从主体性角度看，青年在数字情境中的参与呈现出“参与式文化”的特征。这种“参与式文化”降低了公民表达的社会壁垒，极大地激发了青年的群体认同。青年群体具备较高的媒介素养与技术能力，能够熟练运用多种数字工具进行信息获取与传播。与此同时，青年在网络空间中更容易围绕特定议题、共同兴趣或价值立场形成紧密的社群连接，但其主体性并非完全稳定，仍会受到外生或者内生因素的影响。要理解青年的参与效能，必须深入剖析数字空间在“赋权”与“不确定性”之间的双重属性。

### 1.3 数字公共空间的双重属性

数字公共空间具有“双重属性”，即高度可见性与运行不确定性的并存。一方面，数字空间的可见性极大增强。丹娜·博伊德在分析网络公众时指出，数字空间具有可见性与持久性等核心属性，这使得原本微弱的个体表达能够迅速被汇聚并进入公共视野。(2)另一方面，数字空间的不确定性同样突出。信息传播路径复杂，舆论走向难以预测，一条未经核实的消息可能

作者简介：徐沛媛,2002.09.16,女,汉族,本科,北京东城,职称：无,研究专业方向：翻译硕士-英语口语。

在短短数小时内演变为重大舆情事件。

正如乌尔里希·贝克在“风险社会”理论中所述，现代社会的技术应用在提升效能的同时，也制造了大量的人为风险与系统性不确定性。<sup>[2]</sup>在数字治理的具体场景中，这种不确定性至少表现在三个层面：其一，匿名性导致的责任弱化。网络空间中的匿名表达降低了言论的责任成本，使得虚假信息和恶意中伤的发布更加便利。其二，算法黑箱引发的信息茧房。平台推荐算法基于用户偏好进行内容推送，看似个性化的信息服务实际上将用户封闭在越来越狭窄的信息回音室中。长期浸泡在同质化信息中的青年用户，对异质观点的包容度逐渐降低，在公共议题上容易形成非此即彼的极端化立场。其三，情绪化表达造成的群体极化。社交媒体的传播机制天然偏向于能够激发强烈情感反应的内容，愤怒、悲伤、恐惧等情绪在传播过程中不断被放大，导致理性讨论的空间被进一步压缩。

## 2 数字公共空间中青年参与社会治理的主要路径

### 2.1 基于社交媒体的意见表达与议题参与路径

社交媒体构成了数字公共空间中青年参与社会治理的基础性路径。这一路径首先体现为数字媒介对公共表达机会结构的重塑。传统治理体系中，意见传递依赖层级化渠道，个体较难直接进入公共议程；而社交媒体借助话题标签、评论互动与内容生产机制，提升了个体意见的可见性与传播效率，并推动部分私人困境向公共问题转化。进一步而言，青年在社交媒体中的参与依托平台连接机制形成议题聚合效应。个体经验经由转发、评论与再创作不断扩散，在情感共鸣与经验共享中获得公共性，进而汇聚为具有社会关注度的讨论议题。

同时，社交媒体的即时互动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青年对参与效能的感知，青年基于社交媒体的议题参与呈现出三方面特征：一是议题指向的生活化，主要集中于与个体经验密切相关的现实问题；二是参与形式的多样化，涵盖文本表达、短视频叙事及多种再创作方式；三是参与动力的情感驱动性，情绪在相当程度上成为议题扩散与立场凝聚的重要机制。需要正视的是，这种非正式的、情感化的舆论参与形式，虽然在短时间内能形成巨大的社会可见性，但若要将之转化为实质性的治理成果，仍需向更为规范、稳定的制度化渠道努力，由此引出青年参与的第二条路径。

### 2.2 基于数字平台的公共事务互动参与路径

如果说社交媒体为青年提供的是一个自发表达的广场，那么数字政务平台则构建了一条制度化对话的通道。这一参与路径的关键，在于意见表达能够进入正式治理流程。以中国政府网“@国务院我来说”为例，公众可围绕就业、教育、医疗、住房等议题提交建议，相关意见会被汇总整理，并转有关方面处理或供报告起草研究参考，<sup>[3]</sup>体现出数字技术对政府回应结

构的再造。一方面，平台通过标准化的信息填报与议题分类机制，将原本分散、非结构化的公众意见转化为可处理的数据单元，从而提高治理体系对社会诉求的识别与整合能力；另一方面，平台依托流程化的受理、转办与反馈机制，构建起较为稳定的处理、反馈链条，使青年参与不再停留于舆论层面，而是进入具有制度约束力的治理过程之中。

此外，立法和政策制定中的线上征求意见，也为青年参与公共规则形成提供了渠道。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审议期间，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曾公开征求社会意见；后续审议结果报告明确提到，社会公众就自动化决策、应用程序过度收集信息、未成年人个人信息保护等问题提出了意见，其中一些内容被采纳并体现在法律条文修改中。<sup>[4]</sup>

### 2.3 基于网络社群的协同治理参与路径

如果说社交媒体中的参与主要体现为去中心化的信息表达，数字政务平台中的参与体现为制度化渠道下的程序性互动，那么基于网络社群的协同治理参与，则可被视为一种介于表达与制度之间的中观组织形态，通过关系网络实现行动协同。该参与路径依托数字媒介所构建的社群空间，将原本离散的个体嵌入到具有一定结构性和稳定性的互动网络之中，从而在微观层面实现主体联结，在中观层面形成协同机制，在宏观层面嵌入基层治理体系。

网络社群之所以能够推动青年实现行动上的参与，这源于其在三个维度上的功能整合：其一是社群通过持续互动与情感联结，积累成员之间的信任资本与规范共识，降低集体行动中的不确定性与机会主义风险，从而提升协同效率；其二是社群内部通过信息流通与能力互补，实现知识、技能与社会资源的再配置，使个体能够在分工协作中参与公共事务；其三是社群所形成的“相对强连接”关系网络，更有利于将议题讨论转化为具体任务分配与线下实践。

## 3 青年数字参与社区治理的效能生成、运行困境与优化路径

### 3.1 青年数字参与社区治理的效能生成机制

在数字化转型与基层治理模式重构的背景下，青年群体逐渐从传统治理体系的边缘参与者转向具有潜在结构性影响的行动主体。数字平台通过激发认知、促进协同与强化反馈，在社区治理中形成关键支撑作用。<sup>(5)</sup>但需要明确的是，参与行为本身并不直接等同于治理效能，它的转化依赖一套由认知生成、议题建构与行动反馈构成的连续机制。

在认知层面，青年通过数字平台持续进行碎片化表达，这些表达在平台算法与社交传播的共同作用下不断聚合，推动原本分散的个体经验向公共信息转化，从而提升治理系统的信息感知能力。个体经验在互动中被放大，通过评论、转发与情绪

共振形成初步共识，逐步演化为具有公共属性的议题集合。<sup>[5]</sup>在行动层面，青年通过持续反馈与参与进入治理运行过程，推动了治理结构由单向决策向互动协商转型。

### 3.2 运行失衡与结构性困境的内在机理

尽管数字技术为青年参与提供了条件，但在现实运行中，这一机制在结构层面仍面对一系列相互关联的困境。平台算法强化内容分发的同质化倾向，青年更易在相似兴趣与立场的社群中进行高频互动，这种内群体强化机制虽然能够短期提升表达活跃度，但也导致公共讨论空间逐渐分割，不同群体之间缺乏有效沟通渠道，进而削弱了议题整合能力。这种现象本质上源于社会分类过程中内群体偏好与外群体隔离的强化。而由于社区治理长期受到行政化逻辑影响，评价标准逐渐偏向形式性指标，青年在参与过程中往往将注意力从问题解决转向任务完成，从而导致社会比较的方向发生偏移。当比较维度偏离公共价值时，群体难以通过“积极特异性”获得真实认同。在此情境下，青年既难以形成稳定的价值锚点，也无法通过实践获得真实成就感，进而削弱认同内化的基础。

故而青年虽处于参与过程之中，但在制度结构中往往难以获得实质性位置，其角色更多停留在辅助性与边缘性环节，难以进入决策核心，使其社会认同呈现悬浮特征，缺乏稳定的情感与制度支撑。同时，社区组织结构对核心成员依赖较强，缺

乏制度化运行机制，一旦关键个体退出，参与网络便迅速瓦解。与此同时，平台商业逻辑对流量与可见性的强调，使部分参与行为逐渐偏离公共问题导向，削弱了治理导向的理性基础。

### 3.3 机制重构与治理优化的路径选择

针对上述系统性失衡，应从机制层面对青年数字参与进行整体性重构，以恢复认知、认同与行动之间的有效衔接。首先，在认知生成层面，应通过多源信息整合与跨社群互动机制，打破信息同质化结构，增强不同群体之间的连接能力，使公共议题能够在更广范围内形成共识基础。同时，应结合数字平台与线下实践，使青年在持续互动中逐步形成稳定的社区归属感。

## 4 结语

最后，在行动转化层面，应构建具有累积性的激励体系，将参与行为转化为可记录、可转化的社会资本。例如，通过数字化记录与积分机制，实现贡献的长期积累，并与教育、就业等发展资源相衔接，从而增强参与的持续动力。研究亦表明，缺乏激励机制是制约青年持续参与的重要因素，因此其制度化设计具有基础性意义。青年数字参与的优化关键在于单一工具改进，而在于机制层面的系统重构。只有当认知生成、价值建构、认同强化与行动转化形成稳定闭环时，青年参与才能真正融入治理体系，并转化为持续有效的治理能力。

### 参考文献：

- [1] 冯川.基层治理行政化的演进逻辑及其反思[J].中国农村观察,2023(2):120-144.
- [2] 王立秋.从网络社会到数字社会——评曼纽尔·卡斯特的《数字社会》[J].智能社会研究,2025,(01):177-181+244-245.
- [3] 张弛.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理论及其现实意义研究[D].上海财经大学,2023.
- [4] 共青团中央.青年之家[EB/OL].(2022-09-21)[2026-04-15].
- [5] 杨澜.赋权增能视角下青少年参与社区治理的实践路径研究[J].中国社会工作,2025(2):24-26.